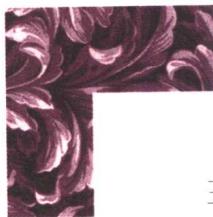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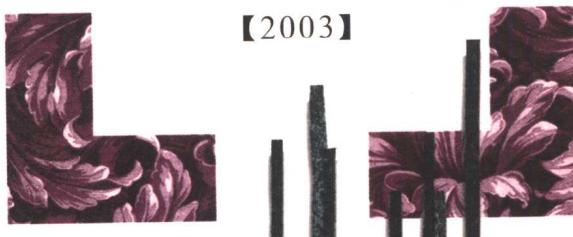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王剑冰 主编

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

【2003】



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

【2003】

王剑冰 主编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3 年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/王剑冰 主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4.2

ISBN 7-5354-2723-5

I .2…

II .王…

III .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 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5052 号

责任编辑:张远林 唐晓娟 责任校对:梁 风

封面设计:徐慧芳 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@public.wh.hb.cn

印刷: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7.125 插页:1

版次: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50 千字 印数:1—10000 册

定价:12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2003 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推选委员会成员

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马瑞芳	王兆胜	王剑冰	王洪应	王童	王雁翎
冯 艺	田中禾	孙 莘	古 耷	刘烨园	何 为
何启治	李木生	李连泰	李钦业	李海波	李铁城
李晓虹	杨守松	杨际岚	张守仁	张燕玲	周同宾
周晓枫	范昌灼	南 丁	施晓宇	姜琍敏	徐开垒
耿林莽	章 武	梅 浩	黄文山	黄晓萍	萧重声
葛一敏	谢大光	彭 程	詹克明	廉正祥	熊育群
潘向黎					

目 录

怀念振铎·巴 金	(1)
萨特：拒绝诺贝尔文学奖·林 非	(9)
乱世中的美神·梁 衡	(15)
彼得堡，沧桑三百年·朱增泉	(31)
走进一座圣殿·周国平	(45)
成吉思汗的上帝之鞭·高建群	(56)
千年疫疬反思曲·石 英	(70)
三过门间老病死·王充闾	(79)
隔海相望的友情·周 明	(89)
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·韩石山	(95)
吃河豚者言·韩静霆	(108)
在可可西里关于白房子的话题·王宗仁	(113)
游泳池记·于 坚	(120)
天穹的漏孔·筱 敏	(136)
血泪凝成的美丽·王本道	(143)

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·2003

-
- 哪里有柔软的石头·余 杰 (148)
编辑家巴金·阎 纲 (155)
熊耳考水·郑彦英 (163)
冻土的家园·冯秋子 (183)
在金字塔下·杨牧之 (195)
2003 年中国散文漫谈·王剑冰 (203)
2003 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提名作品 (215)

怀念振铎

巴 金

一

一九五八年振铎在苏联遇难，当时我正在莫斯科，得到消息最早，我总疑心是在做梦。考虑半天，我才对冰心大姐讲了，她同我一起站在大会主席台上，旁边还有几位苏联作家，我们不便大声讲话，我只记得冰心说了一句：“我想他最后在想什么。”她没有告诉我她的想法，我也没有多问。第二天在回国的航机上，我一直想着振铎，我想知道，他最后在想什么？

在北京分别的情景还在眼前。我们竟会变得那样简单，那样幼稚，会相信两三个月后在共产主义社会再见。那个中午，他约我在一家小饭馆吃饭，我们头脑都有些发热，当时他谈得

最多的就是这个。他忽然提起要为亿万人的幸福献身。他很少讲这一类的话，但是从他的一举一动我经常感受到他那种为国家、为人民献身的精神。不为自己。我认识他以前，读他的文章，就熟悉了他的为人。他星一样闪烁的目光注视着我，我能感觉到他那颗火热的心。机窗外大朵大朵的白云飘过，不过三个月的时间，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这一片“棉花”中再见了？

我安全地回到北京，机场上看不到任何熟悉的面孔，眼前有只大手若隐若现仿佛等着和我握手，我心里一惊，伸出手去，什么也没有。真的告别了！

进了城见到曹禺，他刚说出“振铎”二字声音就变了。我本来想从他那里求得一线希望，结果是我们两人含着泪奔赴郑家。在阴暗的屋子里，面对用手绢掩了眼睛、大声哭泣的郑大嫂，我的每句话都显得很笨拙，而且刺痛自己的心。匆匆地逃出来，我拉着曹禺的手要奔往“共产主义”，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，失去的老友约我在哪里相见。回旅馆我一夜没有闭眼。我发现平日讲惯了的豪言壮语全是空话。

我参加了振铎的追悼会。大厅里看见不少严肃的面容，听到不少令人尊敬又使人揪心的悼词，我的眼光却找不到一个朋友，连曹禺也没有来。我非常寂寞。永别了，我无法找到他约我见面的那个地方！

二

四十年过去了。

四十年中，我只写过一篇哀悼他的文章，是从莫斯科回来后为报社匆匆写成的，只简单地写出我心目中的郑振铎。以后有机会重读，头一两次还觉得可以应付过去，多读几遍，忽然

感到内疚，好像侮辱了朋友。这种奇特感觉我也不知道是怎样来的，但有一件事我永远忘记不了，同他在一起，或者吵架或者谈过去的感情，他从不为自己。我看到敌伪时期他住过的小屋，为了“抢救”宝贵的图书，他宁愿过艰苦的生活，甚至拿生命冒险。看到他那些成就，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外行，我也愿以公民的身分，向他表示感谢。他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多少财富！

振铎是因公逝世的。后来听见一位朋友说，本来要批判他，文章已经印好，又给抽掉了。这句话使我很不舒服。

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北京分别的时候，几座大的博物馆正在那里兴建。他谈起以后开馆的计划，他是那么兴奋。他多年来的心愿就要成为现实，那样堂皇庄严的建筑将体现一个民族的过去和将来。多么光辉的未来。仿佛有一股热，一道光从他身上传过来。以后我每次上北京开会，看到耸立在眼前的博物馆，我第一个念头便是振铎满脸笑容走出来迎接我。“又来了，”我伸出手去，却什么也没有。一切梦都消失了。我还是不能忘记他。

我手边有不少他的著作，书上有他的签名。我们应当是多年的朋友了。有一天和几位友人闲谈，有一位中年朋友质问我：“你记得不记得介绍你进文艺界的是郑振铎，不是别人！”他说得对，振铎给上海《时事新报》编辑《文学旬刊》时，我用佩竿的名字寄去小诗《被虐待者的呼声》和散文《可爱的人》，都给发表了，我还给振铎写过两封短信，也得到回答。但不知怎样，我忽然写不下去，也就搁下笔了。我还记得我在成都的最后一年（一九二二——二三），深夜伏案写诗，隔一道门大哥坐在轿内或者打碎窗玻璃，或者低声呻吟，我的笔只能跟着他的声音动，并不听我指挥，一些似懂非懂的句子落在

纸上，刺痛我的心。大哥的病又发作了。几个晚上都写不成一首诗，也就无法再给振铎寄稿。离家乡初期常常想家，又写过一些小诗投寄给一些大小刊物，在妇女杂志和成都的《孤吟》发表过。以后在上海武昌路景林堂谈道寄宿住下来补习功课，整天就在一张小桌和一张小床前后活动，哪里想得到“小诗”，也不用说文学作品，更不曾给振铎写过信。不但当时我忘记了它们，就是在今天我也没有承认它们是文学作品。否则我就会把《灭亡》手稿直接寄给振铎了。圣陶先生的童话《稻草人》我倒很喜欢，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圣陶先生，他是在开明书店索非那里偶然发现我的手稿的。我尊敬他为“先生”，因为他不仅把我送进了文艺界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，关心我的言行。他不教训，他只引路，树立榜样。今天他已不在人间，而我拿笔的机会也已不多，但每一执笔总觉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写些什么，我不敢不认真思考。

三

我不曾参加文学研究会，圣陶和振铎都是我的前辈。有一段时期我经常同振铎一起搞文学编辑工作。起初我有些偏执，就文论稿，常常固执己见，他比我宽松，厚道，喜欢帮助年轻人，我很少见他动怒，但是对人对事他也认真。我同他合作较多，中间也有吵架的时候。其实不是吵架，是我批评他，我为那几篇文章今天还感到遗憾。在《文学季刊》停刊的话中有一段批评他的文字，当然没有写出他的姓名，我只是训斥那些翻印古书、推销古书的人，我根据传闻，误认为停刊《文学季刊》是他的主意。

我这段文字并不曾与读者见面。不久《文学季刊》停刊号

在上海印刷，振铎发现那段文字就把它删去了，杂志印出来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是在另一本刊物上针对他发表了一篇杂感。但他并不作声，好像不曾读过。我和振铎之间往来少了些，可是友谊并未受到损伤，他仍然关心我，鼓励我。

日子久了，了解较深，他搜集古籍，“抢救”古书，完全出于爱国心，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。他后来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。我看够了日本侵略军的阴谋活动，我熟悉《四世同堂》中老少人物的各种生活。敌人的枪声越来越近了，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，即使是稀世瑰宝，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。当时是我想得太简单了，缺乏冷静的思考。我只讲了一些空话。他从未提及它们，他也不曾批评我。后来我感觉到没有争论的必要，过去的分歧很快地消失了。那时我们都在上海，各人做自己的工作，也有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还记得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先生的遗体在万国殡仪馆大厅大殓时，振铎站在我身边用颤抖的手指抓住我的膀子，浑身发抖。不能让先生离开我们！——我们有共同的感情。

以后还有类似这样的事情。

我似乎更多地了解他了。

四

不仅是了解他，我更了解我自己。也可以说我开始了解自己。

我常常回想过去，我觉得我了解别人还是从了解自己开始的。有一种力量逼着我拿自己同他相比，他做了些什么，我做了些什么，他是怎样做的，我是怎样做的，是真是假，一眼看明。

我渐渐注意到我对自己的要求有了一些改变，我看一个作家更重视他的人品，我更加明确做人比为文更重要。我不知说过多少次在纸上写字是在浪费生命，我不能净说空话，我要争取做到言行一致。写了若干年的文章，论别人，也讲自己，好像有了一点心得，最要紧的就是：写文章为了改变生活；说得到也要做得到。话是为了做才说的。了解这些，花了我不少时间，但究竟了解多少还难说。

我批评他“抢救”古书，批评他保存国宝，我当时并不理解他，直到后来我看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，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，在最艰难、最黑暗的日子里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，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。我承认我不会做他那种事情，但是把他花费苦心收集起来、翻印出来的一套一套的线装书送给欧洲国家文化机构时，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。

五

回顾自己的言行，认真分析每一句话，看每一件事情，我得了一些好处，这也就是一点进步吧。不用别人提说，自己就明白有了什么失误，动脑筋想办法改正错误。不过我并不曾作道歉或改正的表示。

这是内心的自省。我交朋友即使感到有负于人，即使受良心的折磨，我也不作形式上的悔过。这种痛苦超过良心的责备。但十七年中间发生了变化，自己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一种面具，戴上它用刻刀在上面刻上奇形怪状，反而以丑为美。再发展下去，便是残害人类的十年，将人作狗。我受了不少折磨和屈辱。我接触了种种不能忍受的非人生活。

振铎有幸，未受到这种耻辱。近年来我和朋友们经常谈起这位亡友，都说他即使活到“文革”，也过不了那一关。我反复思索，为什么我过得了关而他过不了？我终于想出来了：他比我好；他正，正直而公正。他有一身的火，要烧掉从各方来的明枪暗箭。站在批判台上，“造反派”逼我承认自己从未说过的假话。那种吃人模样的威逼严训像用油锅熬煎我的脑子，我忍受了这个活下来，我低头弯腰承认了他们编造的那一切胡话，这样我才可以顺利过关。否则我的骨灰也不知丢在哪里去了。

根据这几十年的经验，我能忍才能过那一个一个的难关。这并不是容易的事：忍受奇耻大辱。我一直认为，活着是重要的，活着才能保护自己，伸张正义。而不少在“运动”中，在“文革”中被人整死的人和所谓“自绝于人民”的人，就再找不到说话的机会，也不能替自己辩护了。关于他可以由人随意编造故事，创写回忆，一时出现多少知己。

我忍受了十年的侮辱。固然我因为活下去，才积累了经验，才有机会写出它们；但我明白了一点：倘使人人都保持独立思考，不唯唯诺诺，说真话，信真理，那一切丑恶、虚假的东西一定会减少很多。活命哲学和姑息养奸不能说没有联系。以死抗争有时反能产生震撼灵魂的效果。

以上的话在这里也显得多余，因为振铎没有能够等到“文革”。我参加了“文革”，每一次遭受屈辱，就想到他，也想到其他许多人，拿自己同他们比较，比来比去，多少有点鼓舞的作用。努力学习别人的长处，我绝不忘记。

六

今天又想到了振铎，是在病房里，我已经住了四年多医院了。病上加病，对什么事都毫无兴趣，只想闭上眼睛，进入长梦。到这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个无能的弱者，几十年的光阴没有能好好地利用，到了结账的时候，要撒手也办不到。悔恨就像一锅油在火上煮沸，我的心就又给放在锅里煎熬。我对自己说：“这该是我的最后的机会了。”我感觉到记忆摆脱了我的控制，像骑着骏马向前奔逃，不久就将留给我一片模糊。

.....

(选自 2003 年 11 月 21 日《文汇报》)

萨特：拒绝诺贝尔文学奖

林 非

回顾这刚消逝的一百年之间，人类在漫长和浑茫的岁月中，经历了无穷无尽的灾祸与苦难。死伤了多少民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才结束了没有多少时辰，在有的国家里就又横行着像希特勒那样极端专制的暴政，将本来是非常具有聪明才智的民众，压迫和蹂躏得再也不敢把自己心里的话儿倾诉出来，大家都万般无奈和没精打采地充当那几个寡头的传声筒。这种缩着头颅、锁闭心灵，和像鹦鹉学舌那样的生存方式，真是十分悲惨和毫无意义的。至于残忍地流放、屠戮和焚烧千千万万无辜的生灵，以及凶恶地侵略和占领别国的土地，犯下了多少奸淫掳掠和恣意杀伐的滔天罪行，至今还给侥幸活下来的人们，镌刻着异常悲惨和痛楚的记忆。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，为了争夺霸权与资源的大大小小的战争，也依旧是不停地在整个地球上爆发出来。

还有在西方国家某些掌握大工业生产的巨头，为了降低投资与牟取暴利，并未认真地解决污水、油烟与有毒气体的随意排放，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。更有甚者的是一些丧尽天良的家伙，竟大规模地生产具有惊人杀伤力的化学武器等等，整个世界面临着毁灭的威胁。至于垄断财富所造成的崇拜金钱与享乐主义此种诱惑，又是那个社会中间腐蚀灵魂的一种毒剂。

面对着无数生命的消亡和心灵的损毁，多少发誓要捍卫和平与正义，决心要升华道德与情操的人们，应该怎样深谋远虑地思索和奋不顾身地行动呢？萨特就正是毕生都在这样地思索与行动着。

在西方的现代文明将人们照耀得眼花缭乱的光芒底下，萨特聚精会神地注视和发掘着那垄断财富的金钱王国里，竟潜藏着诉说不完的弊病，无时无刻不在推搡与驱赶着多少迷茫的人们，倾圮和陷落于剧烈的异化之中。当人类正摇晃在这生存抑或灭亡的处境里面，究竟应该如何去拯救自身，并且向着合理与健康的目标，一步步地去跋涉和迈进呢？这多么像哈姆雷特那个古老的命题，却重又被萨特在崭新的时代提了出来。他所思考的那些复杂而又艰深的答案，不管人们是否同意和接受，无疑都是出自人类良知与社会责任感的深沉表现。

萨特一心一意所关怀着的是，人类究竟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前景和命运？他为此而思索，为此而写作，为此而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。除开这个纯洁和高尚的人生目标之外，他决无丝毫凡俗的追求，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，“我拒绝一切的荣誉”（《永别的仪式》）。他拒绝了法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，也拒绝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。

这鼎鼎大名的诺贝尔文学奖，在世界上不少文人墨客的眼

里，都当成是性命攸关的头等大事，因为一旦获得了这顶奢华和绚丽的桂冠，从此就会名声大振，引起多少电视和报刊记者的追逐采访，说不定还能够垂之史册，永远被后代的人们钦佩和称赞，纷纷诵读着自己挥洒的那些华章。而且从尘世的眼光看来，那一笔相当高昂的奖金，对于要弄笔杆的多数作家而言，终生都可以凭着它更有滋有味地打发日子了。像这样的荣华富贵，世代扬名，真是一桩巨大得足以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命运的奖赏，当然会引起有些作家很热衷的向往与追求，这完全是合乎情理的。数十年如一日地辛苦劳作，得要付出多少艰巨的努力，升腾几何智慧的结晶。像这样获得了应有的报酬，应该可以说是名正而言顺的事情。

正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具有如此这般的威势，能够产生异常轰动的社会功效，就引起有些作家的朝思暮想，辗转反侧，梦寐以求地追逐着，想摘取这颗似乎是悬挂在天空里的星辰。据说曾有人每当十月下旬的这个日子来临时，就焦急地等待着一年一度颁布的消息，竟穿着挺拔的礼服，戴起高耸的礼帽，想要听到电视新闻里宣读自己的名字，这自然执拗得有些滑稽可笑；据说还曾有人并未受到主持其事者的推荐与提名，却虚张声势和牵强附会地大造舆论，说是在这光芒闪烁的金榜上，差一点儿就嵌上自己的大名，像这样的胡乱吹嘘，更显得有些无聊。

名缰利锁的诱惑力量，对于许许多多混迹于世俗生活里的人来说，肯定都会存在的，谁不喜欢这样大大小小的荣誉，谁不愿意随之而水涨船高般地度过甜蜜的日子？因此出现一点儿荒唐的插曲，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。更何况他们在演出这种小小的喜剧时，丝毫也没有伤害任何的旁人，因此比起那些挖空心思地去诬陷和算计别人的歹恶之徒来，这几位耗尽心血想